

# “近代中国宁波帮的转型与传承暨上海总商会成立百廿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斌 邵钢锋

为深入推进宁波商帮的相关研究,“近代宁波商帮的转型与传承暨上海总商会成立百廿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6月16日在宁波帮博物馆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宁波博物院(宁波帮博物馆)主办,宁波市统一战线理论学会、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企业史研究中心协办,《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商业史学会提供学术支持。数位资深学者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通市档案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宁波商帮后人,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高超群研究员以官商关系为视角阐述了商帮精神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并就甬商、徽商、晋商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他认为,从地域社会结构来看,宁波商帮的精神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二是以组织而非个人或关系网络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李培德以包玉刚为个案,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档案,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华商的机遇、挑战与回应。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从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开始,面对香港于亚太地区的航运枢纽地位和为克服香港在平稳过渡所出现的各种挑战,不断改变投资策略,利用他的政治网络和外交手腕,巩固了华商在香港的社会领导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研究员认为,以籍贯而论,万国商团与宁波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虞洽卿一直担任华商公会会长,发展初期维系其不辍,之后更是促其不断壮大。万国商团中华队的实际参与人与经费捐赠者多为宁波商人,首任中华队队长徐通浩也是宁波籍。宁波商人不仅在参与上海经济发展时崭露头角,在维护市面稳定方面亦大展身手,其重要作用值得深入挖掘。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王昌范则从上海总商会档案资料的开发与利用角度,说明上海总商会档案作为中国档案文化遗产之一,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近百年来,上海总商会档案因政局动荡而屡次受到冲击,所存不易,在抗日战争中为不落敌手而予以焚毁,幸得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存有一套,而流传至今。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孙善根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840—1949)”的进展情况,并指出近代宁波商帮文献不仅有传统的档案、碑刻、家谱、文集等,更有报刊、近代出版物及口述等史料,特别是报刊与档案的电子化,研究者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做大做强宁波商帮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斌对如何进一步深化甬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宁波商帮是唯一历经古代、近代、现代的“长时段”的商帮群体,是宁波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城市名片;宁波商帮研究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学术命题,既有理论意义,也有时代价值,需要学界通力合作,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既要对外内外宁波商帮的史料进行抢救性发掘,建立并随时更新宁波商帮资料库,又要高规格、高要求地保护修缮好具有代表性的宁波商帮历史遗存,使乡愁有所寄托,让城市富有“灵魂”。

第一场主题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锟主持。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简介】李斌,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44,邮箱:letuxuan@126.com。邵钢锋,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浙商研究院研究员,杭州,310018,邮箱:sgf@zjsu.edu.cn。

教授郑忠认为,宁波帮商人及企业家群体通过资本、人才转移,为促使上海发展为长江三角洲增长极城市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近代中国,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整体规划与统一协调,仅靠宁波商帮的反哺家乡,想要实现区域一体化腾飞,只能是一种梦想。商务部研究院博士后、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讲师邵钢锋指出,近代旅沪浙商的商业资本并不限于商贸流通领域,他们除了在航运业、银钱业的不断开拓外,还进一步加快了宁绍地域农家副业的主业化历史进程,并由此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块状经济。宁波市委党校乐承耀教授指出,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宁波帮人士积极参与。第5军88师的宁波籍将士抱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沪上甬籍人士支援前线抗日,并担当起救济难民的社会责任。

宁波业界代表就宁波帮的转型与传承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宁波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天杨基于《宁波民国日报》等文献认为,后来居上的宁波帮对近代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宁波钱币学会副会长王建明探讨了唐宋以来宁波战船街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以及宁波商帮为近代航运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王珏麟认为,在近代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宁波商帮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宁波海关、宁波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胡丕阳认为,大量案例揭示出近代宁波帮迅速崛起发展、经久不衰的原因,这给后人以有益启示。

第二场主题发言,由宁波市文史馆馆长杨欣欣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赵晋副教授围绕刘鸿生、荣德生创业的缘起与动力、行业选择、资金来源与社会阻力等问题,分析其共同与差异之处,以期梳理出中国民族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思想来源与具体实践。浙江图书馆助理馆员黄凯对宁波商人吴锦堂的研究分析表明,参股纱厂、投资水泥、火柴等新式产业是吴氏商业王国不断扩大,进而跻身“阪神财阀”行列的重要原因。吴锦堂也热衷垦荒、办学等事项,且在筹建公所(会馆)、赈灾救济等活动中均有巨大贡献,是神户当之无愧的华人领袖。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后杨硕培通过对近代上海“虞洽卿路”命名始末的事实考证,认为“虞洽卿路”得以命名成功有着复杂的背景。它是由市民联合会提议,工部局董事会通过议案,纳税华人会、上海市商会等联合推动的结果,是虞洽卿凭借自身丰富的经济资本动员社会资本以获取文化资本,进而实现了资本的有效转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田永官以秦润卿于1936至1950年间所写日记为中心,向大家展示了秦润卿的现实关照与家国情怀。宁波大学图书馆馆员李文辉阐述了木业巨商曹兰彬的慈善事业,指出宁波商人的慈善事业弥补了国家力量在近代慈善事业中的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南通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江依据南通市档案馆所藏大生档案,探讨了宁波商人孙淦对张謇的最大帮助在于,张謇考察日本期间,孙淦陪同了部分行程,以及为张謇学生安排实习诸事宜。

宁波商帮的后人代表亦作了发言。沪上著名工商业者竺梅先之孙竺士性介绍了其祖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毁家纾难,创办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并养育600灾童的事迹。柏墅方氏家族第十五世孙方捷详细讲述了其对家族历史的认识。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进行总结。他认为,宁波帮研究建立在史料收集整理基础上,利用前沿理论,秉承创新思维;当前的宁波帮研究者老中青济济一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有传承的研究梯队,因而可以期待更具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宁波帮研究不仅仅利用大量的档案、家谱、方志、报刊等文献史料,还通过与宁波帮后裔建立密切的联系,灵活妥善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记忆及口述访谈资料,从相对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以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情境和从中汲取现实启示。

(责任编辑:马烈)